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近代文化交涉與比較文學

姚達兑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近代文化交涉與比較文學

姚達兌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文化交涉与比较文学 / 姚达兑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203 - 2570 - 7

I. ①近… II. ①姚…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054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392 千字
定 价 1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目 录

第一辑 历史、思想和启蒙

——梁启超与晚清文学新变

梁启超、民族主义与历史想象	(3)
晚清文学的奇理斯玛修辞	(24)
道德的革命：梁启超《新民说》中德性之公私	(41)
斯宾塞福音：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	(57)
离散、方言与启蒙：《新小说》杂志上廖恩焘的新粤讴	(76)

第二辑 翻译、改写和仿写

——中外文化交涉与翻译研究

《粤讴》的英译、接受和叙事	(97)
启蒙教育与政治宣传：太平天国《三字经》的英译和回响	(116)
灵魂城之圣战：班扬《圣战》的最早汉 译本（1884）初探	(136)
插图的翻译和基督教的本色化 ——马皆璧著、杨格非译《红侏儒传》中的插图	(152)
晚清伊索汉译的再英译和仿写	(172)

第三辑 事件、作者和影响

——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

“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熙朝快史》?

- 其作品来源、作者情况和文本改写 (195)
- 杨味西《时新小说》的插图、结构与主题 (210)
- 张葆常的“少年中国”和废汉语论 (224)
- 江贵恩的《时新小说》和《鬼怨》 (238)
- 《时新小说》征文作者考余论：张声和、瘦梅词人、
钟清源 (256)
- 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 (272)
-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之一的傅兰雅时新小说
征文（存目） (291)

第四辑 书评、考证和译作

基督教新教汉语文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刍议

- 评论 John T. P. Lai, *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12. (295)
- 新教中国专案和马礼逊的功绩重探
- 评论 Christopher A. Daily,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Protestant
Plan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308)
- Robinson Crusoe* 粤语译本《辜苏历程》考略 (325)

容懿美译《人灵战纪土话》考略	(329)
汉语基督教文献：写作的过程（韩南撰）	(339)
跋	(364)
参考文献	(367)

第一輯

历史、思想和启蒙

——梁启超与晚清文学新变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杂志《新小说》的第一号封面

梁启超、民族主义与历史想象

两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失地积弱，援朝及甲午再败使中央帝国终于如梦初醒。中国从此被纳入一个普遍历史视野的格局中去。此时，外来文明开始以入侵的方式与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中华文明交流和融合，逐渐促使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

如何从民族拯救国家，如何从过去历史拯救现在国家，流亡至日本的梁启超在 1902 年创办《新民丛报》（1902—1907）、《新小说》（1902—1906）两个杂志时，便遭遇了这两个问题所涉的重重矛盾。第一，此时的民族主义有大小之分。大者是中华文明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以对抗入侵的外来文明；小者为排满，是因清政府的无能而产生的普遍排满情绪。这两类民族主义情绪牵涉两个方面：一是民族主义国家建立时，民族成员的成分问题；二是因民族成员的认同之差异，可能会导致产生分裂现存国家的危险，并会加速外侵力量对中国的瓜分。第二，晚清改良维新与暴力革命的矛盾和专制与共和的选择两相对应。改良与革命、专制与共和，四者的目标均为建立更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更“优质的文明”。但是，其时的改良与提倡君宪兼施专制、革命与提倡排满并创共和，又是纠缠难分。第三，时人无法估量外国历史经验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晚清中国。1902 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是因“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小说所起的良好作用。因而，梁启超等人不仅模仿日本的小说、戏曲改良，而且套用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将之视为成功的典范。然而，他国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土壤上是否适

用，又是堪值怀疑。

这些困扰着梁启超的矛盾，在1902—1903年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许多言论中，得到充分的阐发。相关文章有《释革》《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同时，还有一类相近主题的文章，是对民族英雄的历史和建国历程的叙述，非常值得深入讨论，例如《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作为编辑主体的梁启超，对《新小说》《新民丛报》和广智书局作家群的影响非常之大。因而梁启超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又共时性地波及了后者。

一 借用历史：革命作为工具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的创办是为了发表《新民说》诸篇什；而为了发表构思多年但未及写出的《新中国未来记》，并希望借此推动“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又创办了《新小说》杂志。《新小说》上刊行了如下三部小说——雨尘子的《洪水祸》^①、玉瑟斋主人的《回天绮谈》^②和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③，这三部小

① 《洪水祸》标“历史小说”，现存五回，作者雨尘子。刊于《新小说》第1号至第7号载。未见单行本。

② 《回天绮谈》标“政治小说”，叙述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自由宪章”运动，旨在配合晚清时期中国的“宪政运动”。故虽明面写英国，实际是为对照中国现实。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部外国历史小说，作者选材动机明显是要借鉴外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顾不得其中历史话语的颠倒错用。

③ 岭南羽衣女士（罗普）著《东欧女豪杰》，1902年11月至1903年初《新小说》连载，存五回，影响巨大。小说发表后，时论哗然，不少诗人以诗咏和“女豪杰”与“羽衣女士”。此书选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中华书局1960年版。本文后引据此。羽衣女士，即为康有为弟子罗普。冯自由《革命逸史》“康门十三大保与革命党”一节中，有“罗普，字孝高，顺德人，康门麦孟华之妹婿也。戊戌东渡留学。吾国学生入早稻田专门学校（时尚未改称大学）者，罗为第一人。易西服后，仍留余发不去，故自号‘披发生’。新民丛报社出版之《新小说》月刊中，有假名羽衣女士著长篇小说，曰《东欧女豪杰》……即出自罗氏手笔……”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说都是未完篇作品。这些作品的发表以及后来的停止刊载，都受到梁启超的干预或影响。《新小说》的编辑兼发行者实际上是梁启超。种种迹象表明，杂志上所载的那些作品随着这一阶段梁启超的思想之萌发而出版，及至其思想的转变而停止出版。

《新小说》上刊载的小说《洪水祸》记录法国大革命，现存五回；《回天绮谈》则复述英国“自由宪章”运动，现存十四回；《东欧女豪杰》叙写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苏菲亚，现存五回。这三部小说俱为残篇，前两部叙写革命和自由的历史，后一部也略涉及革命历史，但是主旨更在于宣扬以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的。这三部小说叙写的是法、英、俄三国的革命经验，使得小说满篇弥漫着勃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东欧女豪杰》和《洪水祸》都于《新小说》第一号开始连载，夹在梁启超的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之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实为小说界革命的指导方针：“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①在这里，梁启超把小说革命紧扣住国家的前途，认为可“改良群治”。经由“新”小说，而使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和人格等方面也焕然一新。但是，今人看到的是，《新小说》早期作品与旧小说的区别，仅仅在于所载内容的不同（个别小说在叙述方面有一定的创新），其风格和体式皆取样于章回小说，而且与后者相距不远。“新小说”正是“新”在其内容，以原本处于文类等级低层的“小说”来载“道”。

《新小说》这个杂志从第九号开始，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以梁启超为主笔，后部分则刊行了吴趼人的大量文章，可看出其主笔人员和文章内容有着明显的变化。一些标为“历史小说”“政治小

^①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号，第1页。

说”的作品如《东欧女豪杰》《回天绮谈》《洪水祸》等都发表在前期，它们有倡导革命的共同主题。贯穿后期的历史小说中，仅有一部（《痛史》）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这与后期以吴趼人为代表的主要作者有关。前期梁启超主政时，《新小说》呈现的革命想象，源于梁启超对“革命”与否的尴尬；在后期，吴趼人等作者反对革命、支持改良，但是却倡议“排满”，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表现。毋庸置疑，《新小说》杂志这种前后明显的分期，的确是梁启超一人的思想变化和去日游美有密切的关系。

1902年梁启超等人率先在民族时间、民族历史的重构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并且对世界历史和政治经验有新的发现。梁启超“发现历史”，甚至“发明传统”“发明历史”，正是杜赞奇所论的把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创新之举。^①可看出，梁启超等人对历史的“发现”，实际上是对历史的借用。

首先，民族主义使梁启超“发现”了“民族时间”以抗衡“普遍历史视野”中的世界时间，使中国以民族国家的身姿走向世界，汇入世界历史。正如魏朝勇所论：“梁启超执意并置表述孔子纪年和耶稣纪年，征喻了现代性祈望；祈望的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帝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历史迈进世界历史。”^②1902年梁启超于《三十自述》一文中也说：“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并署有“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③这分明是伟人、英雄传记的笔法，并将个人的形象定位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某个重要位置。梁启超把他的出生与中外四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表示他梁启超“英雄不出其奈苍生何”的高姿态：他的出

① [美]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② 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现将改变中国的现状，将如同曾国藩一样能左右中国历史脚步，将如同意大利建国三杰（此年梁启超有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一文）一样推进中国的改革，以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载于《新小说》第一号的《新中国未来记》开篇便说：“话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公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① 这里的时间既有民族时间如孔子纪年，也有已被当成世界时间的耶稣纪年，如此并举，彰显的不外是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双峰对峙。职是之故，1902年梁启超自号为“新史氏”，发表《论纪年》以鼓吹孔子纪年的适用性。

其次，梁启超借用了历史经验，将其与传统思想杂糅。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生物进化论经过多次转介和重组，被晚清知识分子误读为社会进化论，变成事物发展的一种普遍法则。梁启超对其借用，并杂糅进今文经学三世说的循环世界观。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三世说中之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与时渐进，轮换流转。梁启超此举的目的，正如其自道是：“明三世之义则必以革新国政为主义。”^② 有论者认为晚清“公羊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被认为是（康、梁）“表面上接受了直线发展的历史观，但从根本上则并未摆脱传统的循环历史观”。^③ 也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历史观是线性论的，其论据是梁启超说：“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④ 此外，梁启超的线性“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⑤ 此处姑且不钩沉其影响，但是探赜讨源时，可以从康德（Im-

①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51页。

②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③ 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④ 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⑤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manuel Kant, 1724—1804) 的普遍历史观念 (General Concept of History)^① 那里找到了某种证明, 而且还可以发现, 在以黑格尔 (Georg W. F. Hegel, 1770—1831) “历史” 观念和康德哲学为代表的普遍启蒙视野^② 之下, 梁启超希冀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经此走向帝国主义, 以抗衡西方的霸权中心。

再次, 历史的发现和借用, 并不依编年史的历史经验, 而是按有效的政治经验予以重述。且看载于《新小说》杂志的小说《洪水祸》, 其开篇如是:

今日我们读过西洋史的, 便觉读史时, 有几种新异感情出来。第一, 我们中国的历史全是黄帝子孙一种人演出来的。虽上古有夷蛮戎狄等异种, 近世有契丹女真蒙古鞑靼诸外族, 在历史上稍留痕迹, 究竟我们视之若有若无, 不甚着眼。西洋史, 则自上古至今, 尽是无数种族互处相争, 政治上的事迹, 无不有人种的关系在内。我们看去, 才知世上种族的界限竟如此之严。种族的波澜如此之大。这叫做人种的感情。第二, 中国自古至今全是一王统治天下, 历朝易姓, 也不过是旧君灭, 新君兴。没有别的关系。西洋则国内有君主一种, 有贵族一种, 又有平民一种, 并且贵族常与君主争权, 平民常与君主争权, 不比中国单有君主擅威作福。平民虽多, 不能在历史上占些地位。这叫做政治上的感情。大凡各国史书上的事业不外两种, 一是国内之竞争, 一是外国之竞争。西洋史上的国

①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命题九, “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 必须看作是可能的, 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 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18 页。

② 其形成和宗旨是“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引导了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 正如“永世和平论”所构想的建造一个类似如今联合国一样的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联盟的共同体。孔多塞也表达了“永世和平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见《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文), 此处不论。梁启超对康德的介绍, 可散见《新民丛报》所载, 复集于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054—1064 页。

外竞争多半是人种的关系，国内竞争多半是政治上的关系。^①

以上所引段落昭示的是，首先，近世的战争才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历史有所了解，并将其记述下来，以供“师夷长技以制夷”。在鸦片战争及稍早之前，中国人对于异域的想象，许多时候是无甚根由的文学修辞，直到徐继畲（1795—1873）的《瀛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出版才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它告知士大夫们在中国之外另有一些富强民主的近代国家。在此之前，中国人会以为其他异域都是非文明的，而且其他的人种更是劣等的。其次，所谓“人种的关系”，是指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促使历史叙述的内容也将有所改变，这应当是受触发于梁启超在1902年所论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②新历史观念的形成区分“有历史的人种”和“有非历史之人种”——以是否参与和影响世界史的进程为区分标志，因而受此影响的历史叙述将与以往有所不同。再次，清代中期之前中国人对外族历史视若无睹的民族优越感，因政治机制的失效而失效，从而使国人自卑，最后竟然过分地推崇外族“有效的”历史经验。有意思的是，这种推崇是以政治经验可借鉴为目的，不管所叙的外族历史是否真实。在此目的性之外的信史，其实并不在历史叙述者考虑的范围之内。正如《回天绮谈》（《新小说》上连载的小说）中可以在叙述1215年英国自由宪章运动的同时，插入讨论18世纪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现译《社会契约论》）及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影响。^③所以，与其说作者是叙述过去的历史，更确切地说，

①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1号，第9—10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41页。

③ 梁启超主编（赵毓林编辑）：《新小说》（1902—1906）（复印合订本），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6号，第51页。

他们的历史叙述旨在于关切现在，预瞻未来。

梁启超等人率先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普遍历史视野。他们觉察到中国被当成一个民族国家，被纳入普遍历史视野之中。因而，他们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找到其他“文明”世界的革命经验，借来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梁启超于1912年回忆道：“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①在1903年梁启超有这种转变：从允许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目的为排满并实施民主共和，转而变为主张温和的政治改良。梁启超及其同门，甫至日本横滨，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交善，过从甚为繁密。梁启超曾联合康门弟子劝其师康有为息影林泉，让康门弟子与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派一起合作搞革命。康有为收到劝退书后，怒不可遏，严词申斥，并勒令梁启超转赴美国。梁启超此时的思想转变正源自这一具体事件。因而，《新小说》从第九号起，前半倾向于鼓吹革命，后半倾向于提倡改良，这种转变正源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历史经由叙述，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发表于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的《中国之唯一文学报〈新小说〉》，广而告之曰：“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②小说因为可以以《史记》为典范，故而在传统中一直被好事者认为是正史之根，有补缺之用，“可实际上新小说家明白小说与史书的距离还是相当遥远的，只不过借此强调新小说的价值而已。”^③《新小说》上多数历史小说的主干是以大事件支撑，虚构的叙述、扭曲的修辞，加上鄙陋的言辞，使整部作品看起来与史著相

①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9页。

②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